

## 主持人语

钱林森/周宁

中国比较文学界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被学术史家视为真正“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就共同策划了《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这套丛书(共10本);2002年,钱林森又主编出版了《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共10卷),乐黛云先生高度评价:“如果说《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是第一波,《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是第二波,那么,《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则应是第三波。”乐黛云指出,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第三波,这项研究的特点首先应体现在“交流”这两个字上:它不单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只是以外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是要着眼于“双向阐发”,这不仅要求新的视角,也要求新的方法;特别是总的说来,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多集中于古代文学,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集中于现代文学。如何将两者连缀成“史”实在是一大难点,也是“交流史”能否成功的关键。

严绍璁先生“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基础性学术,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展开,如果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文学或文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联系没有知识,对作为“对象”的文学或文化在人类总体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没有把握,他的一切的研究最终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严绍璁先生将“文学交流”定义为“文学关系”。“文学关系”即“文学交流”研究的最终目标或接近终极的目标,并不是在于只是表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而应该是在特定时空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在“文化”与“文学”的广泛又极细微的流动中,一种性质的“文化”A(这里指称的“文化”当然是包含文学的,而“文学”的传递一定是以更广泛的“文化”为助力的)以各种形式和姿态透入另一种性质的

“文学”B中,于是便引起了B的内在机制发生各种“变异”,正是这一“变异”使得A在整体上或在若干层面上被“解构”,而促使B在相应部位上发生“变异”,最终可能形成“文学变异体”。各种“文学变异体”的形成,表明了“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流动的文化本质,成为各民族文学成长与发育的标志之一,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成果的一翼,体现了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宋炳辉先生认为,文学交流与文学关系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前者以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实为关注的核心对象,而后者则以此为前提,又纳入了关系主体的理解和阐释。宋炳辉先生强调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准备,首先是清醒的头脑。尽管文学关系研究更倾向于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但毕竟不同于史学本身,作为一种研究实践,不管是文学的交流研究还是关系研究,又必须从文化和文学双向传播和影响接受的史料发掘开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必须在某种学术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者除应具备必要的语言能力外,还应有细致的资料收集、甄别和整理功夫和相当的理论准备。所谓的文学关系资料包括:旅行、留学、介绍、翻译等交往记录,文学思潮的影响和作家个性化的借鉴、创造等三个层面。理论准备同样是文学关系研究所必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史料的发现也是以理论意识为前提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三个理论层次或研究方法的三种可能:一、民族文学之间事实联系材料的发掘、梳理和叙述;二、文学思潮层面的梳理和叙述;三、作家具体的创作对外来资源的融化、综合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它融合了作家个体的全部独创性,是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最深层次。

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就学科本质属性而言,属史学范畴,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分类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所以重“事实”和“材料”的梳理。葛桂录先生强调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意义。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而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开展、成熟与它的“文献学”相关。资料搜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首要问题是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原始性是决定史料真实性的重要因素,而史料的真实性又是决定它的史学文献价值的首要因素。探讨文献史料的真实性,离不开史料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并存的特点。具体而言,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1)确定文学关系史料的来源,弄清楚历史文献的材料依据和作者写作的具体情况。(2)确定文学关系史料的可靠性,分析史料引用致误原因。(3)明确文学关系史料的价值。(4)对文学关系史料进行分析批评。(5)说明文学关系史料的利用方法。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在于:一方面总体论述,梳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关系史料特点,归纳中外文学关系史料研究整理的

成就,明确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原则与意义,论证文学关系研究的文献史料价值,总结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类型,探讨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的阐释策略。另一方面,分别查考各类文献里的文学交流史料,比如中外史书、中外交通史及古书抄本里的文学关系史料,总集、别集、丛书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域外汉籍、佛典藏、海外汉学著述中的文学关系史料,传记、年谱、日记中的文学关系史料,报纸、刊物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工具书、索引、资料汇编中的文学关系史料等等。

各种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可以尝试、实验,其目的在于深化和丰富“影响研究”的层面,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研究方法或理论范式的探究、实验,与各种研究类型、研究对象特征密不可分,其有效性与普适性需要得到研究实践的反复验证。王向远先生从中国比较文学的总体方向与方法的高度上反思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指出“中外文学关系”既包括了文学的相互“交流”,即中外文学的事实联系,也包括对应关系、对比关系、类同关系等各种非事实联系;既包括历史性课题的研究,也包括现实性课题的研究,几乎可以囊括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形态与学术特色的形成,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密不可分。本质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就是以中国文学为出发点的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它超越了法国学派的囿于欧洲文学的传播研究、美国学派缺乏历史感的平行研究,而使比较文学进入了一种跨文化的整合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继日本之后,将比较文学由一种西方的学术形态与话语方式,进一步转换为一种东西方共有的话语方式与学术形态,提升为一种包容性、世界性、贯通性的“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文化形态。“跨文化诗学”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对此前的“特征论”和“阶段论”的进一步阐发。“文化诗学”的本质就是超越、打通、整合、融汇,这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非常吻合。从根本上说,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诗学”这一学术形态与学术特性的形成,是在中国学者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这一独特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正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视阈与诗学立场融合,文学交流的传播研究、文本分析的影响研究、文学现象异同的平行对比等多种学术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诗学”的学术特色与学术形态,也使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了“跨文化诗学”的新阶段。

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开发、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与原理范式的研讨。某种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论思路,有助于重新理解与发掘新的文学关系史料,而新的阐释角度和策略又能重构与凸显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将中外文学关系的“清理”和研究向新的深度开掘。车槿山先生探讨文本理

论在文学关系研究中利用的潜在可能性。首先,文本理论可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文本无边界,甚至可以扩展到整个文明的形态。以这种观点看,我们的文学关系研究也许就还有许多尚待涉足的领域。比如,除了我们在跨学科的名义下经常提到的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我们还可以像巴尔特一样研究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或者像文化研究一样,更加关注以往被轻视的媒体、广告、流行歌曲、通俗文学等边缘文类。其次,可以更新我们的研究观念。文学关系研究起源于文学史的写作,总体而言仍属于实证意义上的影响研究范围。这种以文学史为主导的研究框架多少也显露出机械主义倾向以及其他缺陷,所以后来才出现了以关注作品文学价值和美学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我们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理想状态下,也许应该是一项融合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工作。最后,实证性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特有的影响研究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尤其如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实证性研究和影响研究,这方面也需要深化和超越。

总体来说,近30年来,我国学者在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研究大致是围绕着“影响研究”范式进行的。钱林森系统清理了“影响研究”的五种路径:(1)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互补基点上的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外哲学观、价值观交流互补的问题,是某一种形式的精神交流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中外文化、文学相互影响,说到底,就是研究中外思想、哲学精神相互渗透、影响的问题,必须作哲学层面的审视。(2)考察两者接受和影响关系时,必须从原创性材料出发,不但要考察外国作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追寻,努力捕捉他们提取中国文化(思想)滋养,在其创造中到底呈现怎样的文学景观,还要审察作为这种文学景观“新构体”的外乡作品,又怎样反转过来向中国文学施以新的文化反馈。(3)今日中外文学关系史建构,不是往昔文学史的分支研究,而是多元文化共存、东西哲学互渗时代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重构。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到对话并且通过对话获得互识、互证、互补的成果,才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学理层面的应有之义。(4)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课题,应以对话为方法论基点,应当遵循“平等对话”的原则。对研究者来说,对话不止是具体操作的方法论,也是研究者一种坚定的立场和世界观,一种学术信仰,其研究实践既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也是研究者与潜在的读者共时性的对话,通过多层面、多向度的个案考察与双向互动的观照、对话,激活文化精魂,进一步提升和丰富影响研究的层次。(5)对话作为方法论基点来考量的意义在于,它对以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两种模式的超越。这对所有致力于中外

文学关系研究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探索。

周宁先生认为影响研究的真正命题是确定文学“宗主”,特定文学传统如何影响他人,他人如何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并借鉴经验与技巧;平行研究兴盛于冷战时代,试图超越文学关系的外在的、历史的关联,集中探讨不同文学传统的内在的、美学的、共同的意义与价值。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试图颠覆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体系,却没有超越比较文学的理论前提。思想结构的明确与问题域的转换,标志着研究的自觉。首先,不同研究范型的出现与转换,关键意义在于它如何以专业的方式介入现实问题。当今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回应全球化时代文明与文明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和谐的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为比较文学提出的与提供的范型本身都是过渡性的。因为不超越主体立场的比较研究,就无法开展立足“文化间性”的“跨文学空间”研究。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探寻真正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法”,意味着一次新的学术转型。比较文学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到“间性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已经经历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两种模式,呼之即来的第三种模式是“间性研究”。在此宏观立场之外,周宁提出中外文学交流史具体研究的三个层次:一是掌握资料来源并尽量收集第一手的资料。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阐释,从中发现一些最基本的“可研究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编年史式资料复述,其中没有逻辑的起点与终点,发现的最早的资料就是起点,该起点是临时的,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不断向前推,重点也是临时的,写到哪里,就在哪里结束。第三个层次是使文学交流史具有一种“思想的结构”。在史料研究基础上形成不同专题的文学交流史的“观念”,并以此为尺度规划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问题域”,在“问题域”中思考文学交流史的整体性的“叙事”框架。

圆桌笔谈向多元的诠释与批判开放,这只是学术研讨的开始,期待着更多同人的参与。